

(二)南越编勾铎

编勾铎^[1]，一套共八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赵昧墓内。从器身所刻“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铭文来看，该乐器显然是在文帝九年由南越宫廷音乐机构——乐府在当地铸造的。其律制亦当属南越文化的范畴。

从其测音结果可以看出：该套编勾铎的首律为 $\sharp D_4-16$ ^[2]。这个音实际上是由布地首律 A_3+31 按布地律制——《吕氏春秋》三分损益法先产生基音列上的 B_2+35 ，再用此音按纯律三度生律法产生低一音差列上的 $\sharp D_3$ ($\sharp D_3+21$)。然后再产生低四音差列上的 $\sharp D_4$ ($\sharp D_4-20$)。这个 $\sharp D_4$ 的理论值与南越编勾铎首律的实测值仅差4音分，完全可予忽略而视为同音。由此可见，布地与南越使用的音高标准与生律法实际上完全一样，其区别仅在于布地以林钟 E_4+33 为调首，南越则以蕤宾 $\sharp D_4-20$ 为调首。两者相差一律。

(三)句町广南鼓

广南鼓，一件，1919年出土于云南广南。其形制、铜质、纹饰特征与贵县罗泊湾墓铜鼓大体相同。其鼓心音按八度同音的通则，与罗泊湾大铜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其鼓边音 A_3+52 ^[3]与以 A_3+31 为首律的布地律制产生的高一音差列上 \bar{A}_3 的理论值 A_3+51 亦完全相合。其精确程度说明，古为句町之地的广南，至晚在汉代已有了相当高超的调音技术和铸造工艺，而且也具备了与属于越文化范畴的布地完全相同的音高标准和乐律体系。

[1]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2] 南越王墓编铎的测音数据，系1985年9月顾国宝、徐桃英、吴钊用日本产Strobocomm闪光音准仪直接测定。数据待发表。

[3] 吴钊、李昆声、张世铨等：《万家坝、石寨山铜鼓生律法倾向的初步研究》，载中国铜鼓研究会编《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